

论动荡变革期国家大战略的 缔造问题*

宋德星

【内容摘要】 在动荡变革期，国际权势在国家之间、国家之上和国家之下均呈现出分散化趋势，其催生的普遍焦虑情绪使当今时代称得上是一个“战略焦虑时代”。同时，美西方基本国际态度的嬗变和以民粹主义为表征的自利化战略倾向，直接冲击着国家间关系。进入 21 世纪后，美国的首要地缘战略关切发生了由陆向海的历史性转变，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海洋国家对华联合阵线的形成。上述战略环境的变化，决定了中国国家大战略的缔造必须高度重视国内发展，这是其赖以成功的基础，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外部战略环境的优化问题，并切实增强战略思辨性，客观理性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掌握好力量运用的艺术。因此，在中国国家大战略的缔造过程中，需要对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都予以足够重视，并将其视为一个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的过程，从而确保其内在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 动荡变革期 中国 国家大战略 地缘政治 国际权势

【作者简介】 宋德星，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邮编：210039）

【中图分类号】 D822 K90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4)02-0001-23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402001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上丝绸之路地缘安全及其风险管控研究”（18ZDA130）的阶段性成果。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① 作为与和平稳定相对应的概念，动荡变革意味着矛盾、挑战之严峻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情势之紧迫性及重要性，使得主要行为体不得不采取不同于以往的治国方略，体现出了显著的变革趋向，当然仍有传承的一面。其中，结构性因素作为关键变量所生发出的动能与变化，足以根本改变国际政治的基本面貌，而这主要涉及国际权势结构、地缘战略首要关切和美西方的基本国际态度或国际政治文化。上述要素既系统作用于国际战略环境，又深刻影响国际战略心理，从而不可避免地在客观形态和主观认知两大方面牵引着主要国家的大战略缔造与实施，使得动荡变革期国际社会的治国理政方略与政策行为逻辑不同于以往。因此，当今中国国家大战略赖以实施的国际环境、国内基础和决策素养等均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优化，如此才能在动荡变革期中赢得先机和主动。据此，文章将重点探讨四个问题，一是国际权势分散化大趋势及其战略效应，二是民粹主义蔓延及其催生的美西方自利化战略倾向，三是美国地缘战略首要关切由陆向海的转变对其打造海洋国家对华联合阵线的意义，最后阐释中国国家大战略应重点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国际权势分散化及其催生的战略焦虑

在谈及现代国际关系时，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和巴里·布赞（Barry Buzan）这两位非同凡响的学者强调指出，国际关系的现实世界已经从一个权力、财富和地位差别很大的殖民主义国际社会，转变为一个更加多元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财富、权力和文化权威的分配在西方和其他国家之间变得更加均衡。对国际关系的思考也从中心和外围之间的分离，转向日趋一体化。^② 也就是说，从整体上把握国际关系及其发展变化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其中，作为国际体系核心要素的国际权势结构为我们对现代国际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6 页。

② [加]阿米塔·阿查亚、[英]巴里·布赞：《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刘德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中文版序，第 VIII 页。

关系进行系统把握和整体思考提供了有益的路径。当然，不同于冷战时期人们所熟悉的那种高度结构化、具有相当稳定性的权势结构——美苏两极，冷战后国际权势结构走向了另一面，即日益分散化，其带来的不确定性直接催生了普遍的战略焦虑情绪。

（一）国际权势分散化在国际关系中的映射

国际权势分散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发展不平衡规律，以及先进技术、管理和理念的扩散。据此，在论及冷战后这种结构性变化时，阿查亚和布赞作了如下历史性总结。首先是在 1989 年之后，国际关系中的中心和外围国家之间财富与权力的不平衡开始被打破；其次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这种不平衡因美国“表象上的”单极化得以短暂维持，但很快就中断了，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不同程度的崛起；再次是 21 世纪初，由 19 世纪现代性革命引发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遗留下来的中心与外围之间的财富和权力差距明显消失。到 2017 年，“西方的全球主导地位已经接近尾声。一种后西方世界秩序正在形成，在这种秩序中，西方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或占主导地位财富、权力和文化合法性的中心”。^①

如果说苏联的解体意味着两极格局的瓦解和美国单极霸权的确立，那么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则意味着新的国际权势结构开始生成，且以一种中短期内东西方实力日渐接近、远期则可能是东升西降的趋势发展变化着。概言之，这大体上需要经过三个历史阶段，即两极和“单极时刻”的结束、东方崛起及其与西方实力的接近、东方成功超越西方三个阶段。其中，国际社会已经见证了其中的两个关键性历史阶段。一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东欧剧变、华约解散、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直接宣告了美苏两极权力结构的终结，世界随之进入到美国的单极霸权时期。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从一个由美国和苏联主导的高度结构化的两极世界，走向了一个美国单极独霸的、充斥着新的不确定性的世界。^② 二是

^① [加]阿米塔·阿查亚、[英]巴里·布赞：《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导言，第 5—6 页。

^② 所谓高度结构化，根本在于其“集团身份”与行动逻辑，即在两极体系下，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凭借其优势不仅建立了敌对的阵营，将其“集团化”，而且进行较为严格的管理，由此造就了每个阵营都有一个独特的身份和相应的权力基础，总体上集中决策和集

21 世纪国际权势结构再次发生历史性变化。在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中，国际权势结构体现为“一超多强”，核心是美西方占有主导性优势地位；^① 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在新兴大国崛起、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和推动下，国际权势转移进程明显加速，国际力量格局出现新的显著变化，其中最具时代意义的是东西方之间（特别是中美之间）的权势转移在全球范围内渐次展开，美西方原有的主导性优势地位难以为继。^②

上述两个关键阶段的权势分散化进程，直接冲击着美西方的权势优势地位。恰如布赞所称，从短期看，美国自二战以来所取得的非常态统治地位一直受到欧日复兴和新经济大国崛起的双重削弱。从长期看，现代化通过国际体系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西方在 19 世纪的那种压倒世界其他地区的巨大优势在持续衰减。权力基础的不断分散不仅造就了新的大国，而且使任何国家都越来越难以获得超级大国地位所需的相对实力。^③ 如今，国际战略界的一项基本共识是：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美国一度拥有的单极时代已经结束，^④ 取而代之的将是世界多极化，在这种多极化趋势中，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究其原因，在于以下颇具说服力的论断，即随着新兴大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它们将有能力、有意愿把资源投向战略军事领域，从而显著增强其军事实力。

（二）国际权势分散化在行为体中的反映

国际权势的分散化不仅在大国关系中有着鲜明的映射，而且在行为体之间也体现得十分明显，集中表现为冷战的结束不仅带来了国家之间关系的调整，还带来了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之间的新型权力分配。在全球化的经济中，国家需要与企业、国际组织、众多的公民团体这些非政府组织分享权力，

体行动是其一大特色。

① 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英]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 世纪的世界政治》，刘永涛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年版，第 75—76 页。

② 宋德星：《大变局下中国外交的时代风貌与主要实践》，《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3 年第 3 期，第 3 页。

③ [英]巴里·布赞：《权力、文化、反霸权与国际社会：走向更为地区化的世界秩序？》，刘伟华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11 期，第 28—29 页。

④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1, 1990, pp.23-33.

包括分享作为主权权力核心的政治、社会和安全权力。从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始，权力稳步集中在国家手中，但这已经结束了，而且已有一段时间了。^①

所以毫不奇怪，在冷战后的国际体系中，开始出现所谓的主权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深度联合”（deep coalition），^② 即它们共同作用于国际体系的方方面面。出现的结果是，全球化时期国际事务的决策和各种关系的处理已趋于在一个包容政府、企业、政府间的和非政府的国际组织等角色的复杂体系中进行，仅仅把视角投向国家的职能和政府间的关系，已很难从整体上把握时代发展的现实和趋势。^③

对于这种权力转移，杰西卡·马修斯（Jessica T. Mathews）将之归因于组织结构的变化：从等级结构到网络，从强制中心到自愿联合。这种转变的引擎则是信息技术革命，因为它赋予了个人和团体急剧扩大的交往能力，同时削弱了传统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股强大的全球化力量，它们也会产生负面的效果，通过使分散在全球各地越来越多元化的认同和利益团结和壮大起来，从而放大了政治和社会的分裂。^④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增长及其能动作用引发了关于国家行为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继续行使其主权的新辩论。至少在数字网络领域，已然存在着不同形式的“主权对话者”，它们不仅受到国家的巨大影响，而且还因非国家行为体（包括但不限于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的能动作用而被强化。^⑤ 因此，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关于国家主权是否受到互联网侵蚀的争论成为国际政治中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⑥

今天，信息技术革命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日益增强，^⑦ 并正在塑造一种

① Jessica T. Mathews, “Power Shift,”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1, 1997, p. 50.

② Alvin and Heidi Toffler, “Foreword: The New Intangibles,” in John Arquilla and David Ronfeldt, eds., *In Athena’s Camp: Preparing for Conflict in the Information Age*,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1998, pp. xix-xx.

③ 王学玉：《从国际化到全球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 年第 8 期，第 51 页。

④ Jessica T. Mathews, “Power Shift,” p. 52.

⑤ Abid A. Adonis, “Critical Engagement on Digital 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ctor Transformation and Global Hierarchy,” *Global Jurnal Politik Internasional*, Vol. 21, No. 2, 2019, p. 268.

⑥ *Ibid.*, p. 263.

⑦ Myriam A. Dunn, “Securing the Digital Age: The Challenges of Complexity for Critical

复杂的权力分配模式，导致在“多中心次体系”（multi-centric subsystem）中，非国家行为体被赋予了新型权力，从而有能力影响国家在国际体系中作为主要参与者的地位。^①

（三）国际权势分散化催生了普遍战略焦虑

就国际权势结构而言，在冷战结束以来的三十多年里，中国、印度以及全球南方国家的复兴与崛起进程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正在深刻改变着国际权势的基本面貌，因而会不可避免地催生新一轮大国竞争。一方面是中国、印度等非西方新兴大国的崛起势不可挡，另一方面是美西方不甘心丧失自己在国际权势格局中长期占有的主导地位。为维护自身霸权，美西方对崛起的新兴大国（主要是中国）从警惕和疑惧，发展为肆意遏制和打压，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紧张。正是因为国际权势转移与美西方的霸凌政策交互作用，使得大国战略竞争将在很长时期内成为国际政治的主题之一。

与此同时，非国家行为体日益发展，并充分利用国际体系结构性权势控制的松弛、某些弱国的主权失能甚至是“国家失败”、非传统安全议题的涌现、对人类整体安全的关切催生的国际舆论张力等诸多问题，开始与主权国家共同作用于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进入 21 世纪以来，信息技术革命对非国家行为体的赋能尤为明显，其中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及全球扩散在短短几十年内从根本上重塑了社会，在国际政治中，它正迫使外交官们重新思考治理、秩序和国际等级制度等核心问题”。^②

上述两方面的变革趋势催生的不仅仅是危机感，而且使得当今时代称得上是一个“战略焦虑时代”。^③

首先，就大国关系而言，尽管构建一个可预期、稳定的大国关系基本框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and IR Theory,” in Johan Eriksson and Giampiero Giacomello,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ecurity in the Digital 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89.

① See James N. Rosenau,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② Elsa Hedling and Niklas Bremberg, “Practice Approaches to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s of Diplomacy: Toward a New Research Agenda,”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3, No. 4, 2021, p. 1595.

③ 宋德星：《后冷战时代大战略缔造特有的困难——兼论中国大战略缔造问题》，《外交评论》2008 年第 6 期，第 19—26 页。

架实属必需，但因国际权势转移不可避免会格外困难。结果是我们正从一个良性的全球化时代，进入一个大国竞争的新时期。我们将迎来一个更加分裂的世界，一个更加不确定的世界，会有更多的外部风险、更多的波动和更多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的动荡事件。^① 也就是说，尽管自近代国际体系形成以来，大国竞争乃至大国战争就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永恒主题，但今天大国竞争的战略风险已非过去所能比拟，它首先冲击的是大国关系基本框架。在这方面，中美关系所受的冲击最为明显。面对国际权势转移和中国的崛起，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不仅是维持而且是要增强其实力，并以各种方式遏制中国的崛起。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逻辑，中美关系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急剧变化，并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金融、科技、教育、社会、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展开竞争。

其次，对于主权国家来说，大变局同时也是一个有待重新认识、重新适应、重新掌控的崭新局面。恰如布赞所述，“在高度紧张但相互依赖的体系内部出现真正全球化意义上的权力分布这一前景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在欧洲崛起前，我们曾有过全球性的权力分布，但当时所处的场景是一个相当薄弱且相互依赖程度非常低的国际体系。欧洲崛起后，我们也曾有过一个紧张却相互依赖的体系，但几乎所有权力集中在西方国家和俄国手中。因此我们当前面临的局面是全新的。”^② 也就是说，直面变局、动荡和不确定性将是国际社会的新常态，因而需要不同于以往的战略指导。

再次，上述权力的分散化趋势必然导致权力游戏规则的变化，并充分体现在全球治理领域。如今，国际体系变得更加复杂，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独立的国际和跨国行为体在国家、区域和全球的多个层面上玩权力游戏。^③ 正如时殷弘教授所言，“大量非国家行为体和所有国家各自在

^① “DPM Lawrence Wong’s Dialogue at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October 13, 2023, Newsroom, Primer Minister’s Office of Singapore, <https://www.pmo.gov.sg/Newsroom?page=1&type=Dialogue>.

^② [英]巴里·布赞：《权力、文化、反霸权与国际社会：走向更为地区化的世界秩序？》，第18页。

^③ See 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Robert Jervis, “Complex Systems: The Role of Interactions,” in David S. Alberts and Thomas J. Czerwinski, eds., *Complexity, Global Politics, and Nat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45-71.

各功能领域的存在与活动，连同它们互相之间纵横交错、形式繁多的合作、抵触和冲突，形成了一个远比过去时代广泛和丰富的世界政治构造——当代全球‘复杂聚合体系’（complex conglomerate system），非国家行为体在其中起着先前难以比拟的重要作用。作为在国家‘之上’和‘之下’的角色，它们的存在、增生和作用联系使得世界政治大大地复杂化了。”^①

上述结果投射在战略领域，必然使得大战略固有的协调功能明显弱化。在谈及冷战后美国的国家大战略时，保罗·米勒（Paul D. Miller）就感叹战略环境的复杂性，越来越使得“大战略不可能是一个协调‘整个国家’诸多努力的计划，这样的概念似乎不切实际，我们也不应该指望大战略是一个解释一切的总概念（master concept），同时又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标签来进行概括”。^②

二、美西方基本国际态度的嬗变与自利化战略倾向

就美西方的国际政治思想而言，自由主义一度被奉为圭臬。冷战的结束更是被西方冠之以“历史的终结”^③和“自由主义的胜利”。但事实恰如艾伦·卡汉（Alan S. Kahan）所说，自由主义的胜利并没有持续多久。2001年“9·11”事件凸显了极端主义的挑战，许多人将2008年的金融危机归咎于新自由主义，再加上激进民族主义的复兴，所有这些情况共同促进了全球民粹主义的发展。^④正是在民粹主义的驱动下，美西方基本国际态度出现了新的变化趋向，自利化成为其主要的政策取向，并直接冲击着国家间关系。

（一）民粹主义的全球蔓延

民粹主义尽管不是什么新鲜事物，^⑤但在21世纪，民粹主义的兴起与

① 时殷弘：《全球性交往、相互依赖和非国家行为体》，《欧洲》2001年第5期，第8页。

② Paul D. Miller, *American Power and Liberal Order: A Conservative Internationalist Grand Strategy*,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xii.

③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pp.3-71;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1989, pp. 3-18.

④ Alan S. Kahan, *Freedom from Fear: An Incomplete History of Liberalism*, New Jersey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3, p. 416.

⑤ 关于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因探讨，参见谢里·伯曼：《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因》，

新的动荡变革期相叠加，直接催生了普遍的保守情绪和急躁情绪。其中，2008年的金融危机成为重要的转折点，其不仅严重冲击了经济全球化，而且颠覆了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个世界观，即对自由市场的崇拜。这场意识形态危机在处于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许多国家，尤其是欧洲和美国，催生了一个保卫民族国家的“民粹主义时刻”。^① 人们发现，在民粹主义的支持者中，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糅合了文化和经济因素，而这些因素往往又在地理空间上得到集中映射，即一些边缘化、衰落中的村落、城镇、工业中心甚至是国家，其经济、文化和政治影响力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使得某一部分人口不仅在物质上受到挤压，而且在社会尊严和社会地位方面受挤压感更甚。^②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粹主义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鼓动的结果，而且是整个社会乃至世界动荡变革的结果。因此其产生的影响不仅深远，而且短时间内难以消除。如何应对民粹主义带来的挑战，也就成为主要国家的一大难题。有观点甚至认为，到了2020年，人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民粹主义的崛起是自苏联解体以来对战后秩序造成的最根本的挑战。^③

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民粹主义浪潮与金融危机、难民危机、逆全球化相互影响，并最终在全球蔓延。就美西方而言，作为西方民主自身投下的阴影，“民粹主义并不仅仅在于提供了特定时机的怨情的社会背景，而且在于民主存在着无法克服、相互冲突的两个面向，即救赎（redemptive）面与现实（pragmatic）面。前者是指代表人民主权、平等与自由、人民有平等的机会参与政治的理想，后者是指让民主政治得以运行的法治、代议政治、政党竞争、利益团体、周期性的选举等。”^④ 所以毫不奇怪，“无论是在美国、英国、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俄罗斯、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以色列还是印度，民粹主义者都把他们的敌人视为自由主义精

李月军译，《国外理论动态》2021年第6期，第138—148页。

① 张莉：《正在崩塌的“自由主义共识”海市蜃楼——西方民族民粹主义与“非自由主义”兴起》，《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第110页。

② Alan S. Kahan, *Freedom from Fear: An Incomplete History of Liberalism*, p. 423.

③ *Ibid.*, p. 422.

④ Margaret Canovan, “Trust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Vol. 47, No. 1, 1999, pp. 2-16.

英。”^①相应地，反建制和反精英的民粹主义“大反叛”成为西方政治的“新常态”。

（二）民粹主义兴起对国际政治文化嬗变的影响

21 世纪民粹主义的兴起与蔓延，直接导致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大国内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的历史性变化，并以一种异化的方式作用于外交哲学和国际关系，其产生的消极影响甚至不亚于国际权势转移所催生的普遍战略焦虑情绪。

在西方，人们越来越感受到新自由主义所推动的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特别是中产阶级自感面临着一个无望的未来。究其原因，就像一项研究所指出的，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暴露了战后相关共识的潜在脆弱性。冷战后新自由主义并没有恢复 1945 年之后几十年的广泛经济活力，而是不成比例地为西方社会的某些群体恢复了日益增长的繁荣，^②结果是西方中产阶级在整体经济生活中失去了原有的活力。

而信息革命不仅使社会不再受精英、政党和传统大众媒体的控制，而且为民粹主义者提供了表达自身观点和维护利益的平台，这一点在美国尤其明显。许多传统的美国中产阶级无视建制派精英控制的常规影响力渠道，投票给了能够表达他们的观点、恐惧和担忧（但可能不是利益诉求）的非标准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正是这种不受控制和特朗普作为一个反对建制派的候选人的胜利，反映了席卷大多数美国精英的近乎疯狂的愤怒。^③尽管民主党人拜登取代特朗普执政，但美国仍将深陷国内政治极化与撕裂之中，且不得不直面由此造成的双重后果：国内政治斗争不断与国际焦虑重重。

在日本，自民党政府一度希望在稳固国内执政地位的基础上，积极寻求修宪和进行以“印太”为核心的外交大布局，但同时也不得不直面全球力量平衡变化、国家间战略竞争加剧、现有秩序面临挑战等困局。为此，日本强

① Alan S. Kahan, *Freedom from Fear: An Incomplete History of Liberalism*, p. 418.

② Peter Heather and John Rapley, *Why Empires Fall: Rome, Americ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3, p. 144.

③ Sergei A. Karaganov and Dmitry V. Suslov, “A New World Order: A View from Russia,”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October 4, 2018, <https://eng.globalaffairs.ru/pubcol/A-new-world-order-A-view-from-Russia--19782>.

调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已经进入了 21 世纪一个新的危机时期。实际上，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新的危险还来自日本国内政党政治和政治文化的潜在变化趋向，其核心就是日本开始表现出新一轮“外交政策第一”的政策取向，将急切地参与国际权势大争斗视为战略要务。^①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 Fontelles）也表达了同样的战略担忧，认为在缺乏规则和“主要玩家”无法就全球问题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世界秩序将在安全、技术和经济一体化领域分裂成相互竞争的集团。^②

就非西方大国而言，俄罗斯自 2022 年 2 月 24 日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便深陷与美西方的直接战略对抗之中，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金融、文化、社会乃至民族心理各个方面。导致的结果是，“今天俄罗斯不再是国际秩序的缔造者，而沦为一个被动地接受自己的角色和地位的国家，至少俄罗斯人担心大国会这样看俄罗斯。”^③ 在被美西方全面孤立和打压的背景下，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回潮也就不可避免。此外，自 2014 年执政伊始，印度莫迪政府就出台了一系列颇具政治胆识和改革勇气的政策举措，成功推动了印度作为新兴经济体的迅猛崛起势头，强化了稳固执政的国内基础，但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同样激起了国内的反对声浪和国际社会的警觉。全球南方国家特别是一些中等强国在乌克兰危机之后展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战略自主性和战略能动性，其传达的集体声音使得主要大国也不得不给予应有的关注，但它们在纲领性政策共识和制度化平台上的缺失不仅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战略发展空间，而且使其战略实施同样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建立在民族主义之上的广泛政治动员。

（三）美西方自利化战略倾向及其对国家关系的冲击

从某种意义上讲，民粹主义的兴起、大国政治生态的变化、国际政治和

① *Defense of Japan 2022*,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2022, https://www.mod.go.jp/en/publ/w_paper/wp2022/DOJ2022_Digest_EN.pdf.

② 《欧盟首席外交官：“发展中国家正在寻找西方替代者”》，参考消息网，2023 年 9 月 30 日，<https://www.cankaoxiaoxi.com/#/detailsPage/%20/dc92241c0675482d878dbbeef77bb000/1/2023-09-30%2019:27?childrenAlias=undefined>。

③ [美]罗伯特·A. 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8 页。

世界经济的内在紧张、美西方国家内部政治撕裂与混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和区域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同时出现了某种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已经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直到过去十多年才全面显现出来。也就是说，国际秩序及其基本结构已经开始松动。

第一，最显著的变化是国际政治权势结构的松动，即国际权势转移进程的加速，表现为西方（首先是欧洲，然后是美国及其盟友）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五百多年的主导性统治地位的终结。尽管美西方在国际体系的某些方面仍占有较为有利的地位，但是中国、印度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并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呈现出足以塑造国际秩序的强大能力。

第二，世界经济领域的结构松动。众所周知，战后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由美国主导建立，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向整个世界扩展。在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扩展的过程中，美西方一厢情愿地希望新兴经济体最终能按照西方的经济和政治模式改变自己，并作为“学徒”加入西方，完全无视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是否适应各自国情的的问题。然而，冷战后不断累积的矛盾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中集中爆发，并充分暴露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弊端。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经济复苏乏力。在 1999 年达到峰值后仅仅 10 年，西方在全球产出中的份额就缩水了四分之一，由占全球产出的 80% 降至 60%。尽管随着各国政府和央行为经济发展注入大量资金，危机最严重的直接影响很快得到了遏制，但西方国家自 2008 年以来一直未能恢复过去的增长率，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仍保持在高位。结果是，西方在全球生产总值中的份额继续下滑。^① 与经济问题相比，更为严重的则是“曾经辉煌的西部‘品牌’已经失去了光环，现在经常给人留下一种民主国家内部严重分裂、优柔寡断的印象，这些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多地只给少数人带来好处”。^②

在此背景下，由西方大国主导制定的规则不能完全反映新兴大国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它们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过程中，坚决反对美西方以国家安全为由推行带有浓厚保护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所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

^① Peter Heather and John Rapley, *Why Empires Fall: Rome, Americ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p. 10.

^② Ibid.

起直接导致了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崩塌。当美西方发现新兴大国的崛起对其经济、金融和科技优势地位构成挑战后，又开始采取“去风险化”“小院高墙”这类冷战式脱钩、封锁、打压政策，从而导致经济政治化、安全化、民粹化趋势愈加明显。

第三，在战略军事领域，美西方同样处于美国《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中所称的“战略萎缩期”。该报告指出，“美国军事优势面临的挑战代表着全球安全环境的又一个转变。几十年来，美国在每个行动领域都享有无可争议或主导性的优势。我们通常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部署军队，在需要的地方集结部队，并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采取行动。今天，每个领域都出现了竞争，包括空中、陆地、海洋、太空和网络空间。”^①为此，美国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国和俄罗斯，诬称“美国的繁荣和安全面临的核心挑战是重新出现的与修正主义大国之间的长期战略竞争”。^②

由于美西方国际政治文化的异化及其基本国际态度的逆转，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已经成为政治上最不正常的富裕国家。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恶化的速度比美国领导人修建“新护栏”的速度还要快，而且今天的国际机构不再能够反映世界上真正的力量平衡。^③而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在民粹主义的持续影响下，像“美国优先”这样的自利化政策倾向开始成为美国新的政治正确。因此，特朗普政府在涉及美国盟友利益的地区安全事务上，也要求相关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和成本，“发达国家之间的紧密合作曾经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意志和权力的产物，这一权力中心如今却在抛弃支撑这一理念的价值观和利益观，这几乎会改变一切。”^④美国对盟友与伙伴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与冲击了。

有鉴于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非西方国家更加积极地推进国际政治多

①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8, p. 3,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② *Ibid.*, p. 2.

③ Ian Bremmer, “Navigating the Geopolitical Recession,” *Speakers Spotlight*, <https://www.speakers.ca/speakers/ian-bremmer/>.

④ 马丁·沃尔夫：《西方分裂与世界秩序》，FT 中文网，2018年1月4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5749?page=2>。

极化进程，并且相信以下基本判断：“虽然向真正多极化的转变——不仅体现在经济上，而且体现在军事上和议程设置能力上——会让许多人感到不安，但后西方的多极化终将比以往任何秩序都要民主得多。”^①就中美关系而言，“管理竞争”成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这是因为与冷战后期中美关系相对稳定完全不同，今天的中美关系因美国政治生态的变化和国家大战略的调整再也回不到过去，“最有可能的是，我们将看到一种不断变化的‘有管理的竞争’（managed rivalry），这需要不断适应变化的关系和条件，也意味着持续重新谈判和调整”。^②

三、美国首要地缘战略关切的历史性转变与新一轮战略大角逐

上述体系结构的松动和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使后冷战时代成为“战略焦虑时代”。在这样的时代特质下，世界主要大国、强国之间不仅展现出了较强的战略博弈倾向，而且围绕世界秩序问题的竞逐正急剧撕裂国际社会。为此，国务家们也遵从地缘政治的逻辑，从权势对比的变化出发，反复阐释政治地理的时代意义，希望借此来揭示国家关系的空间逻辑，并将之贯彻到对外战略和国家关系的运筹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拉开了新一轮世纪性的战略大角逐。

（一）西方针对欧亚大陆的“大欧洲”战略及其困扰

就美欧国家而言，在冷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其首要战略关切在于阻止一个敌对国家或国家集团控制欧亚大陆。毫无疑问，这个所谓的敌对国家就是俄罗斯。因为对于美欧来说，“作为冷战的胜利者，西方不会满足于正在赢得的胜利，这就是它的问题所在。”^③为了防止俄罗斯未来向西扩张，美国和欧盟制定了一个明确的“大欧洲”扩展战略，即欧盟和北约的“双东扩”。这一战略的内在逻辑是：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中东欧国家通过加入欧盟和

^① Oliver Stuenkel, *How Emerging Powers are Remaking Global Order*, Cambridge and Malden: Polity Press, 2016, p. 205.

^② *Ibid.*, p. 94.

^③ Gregor Gysi, “Europe and the Crisis in Ukraine: I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acing a New East—West Conflict?” *Israel Journal of Foreign Affairs*, Vol. 8, No. 3, 2014, p. 78.

北约，在政治上和地理上将是跨大西洋体系的一部分。而体系之外的任何国家（包括俄罗斯）都无权阻止符合条件的中东欧国家加入跨大西洋体系。^①

遵循这样的政策逻辑，自1999年北约实施东扩以来，共有14个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2009年5月，欧盟与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这六个国家正式启动“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美欧的“大欧洲”方案不仅旨在从政治上拓展和巩固其盟伴关系，而且旨在削弱俄罗斯对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力，自然引起了俄罗斯的敌意。

对于冷战后的俄罗斯来说，其地缘环境的一大现实就是欧亚大陆外围势力向核心区域渗透，而不是传统上的核心地区影响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② 尽管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大欧洲”战略方案——欧亚联盟战略，并拥有针对美欧的某些反制手段，但在与美欧的战略博弈中，俄罗斯有很深的挫败感和危机感。2021年12月，在就乌克兰问题发表讲话时，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结论是：“当我们就原则问题进行平等对话而实际上没有得到美国和北约的回应时，当我国面临的威胁明显上升时，俄罗斯完全有权采取回应措施以确保自己的安全。”^③ 直接结果就是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并一直延续至今。就像美国大战略理论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指出的那样，“俄国从地缘政治和历史的角对乌克兰的分离地位的疑问，正好与美国关于一个帝国型的俄国不可能是一个民主的俄国的观点迎头相撞。”^④

2022年4月，美国学者撰文指出，“尽管西方国家尤其是与俄罗斯存在复杂历史关系的中小国家对俄罗斯抱有强烈的负面态度，但是敌对从来不

① 《普京万字讲话全文：西方骗了我们，直接把刀架喉咙上》，中华网，2022年2月25日，<https://news.china.com/socialgd/10000169/20220225/41454007.html>。

② 在2014年的北约外长会议上，北约秘书长表示，“在北约扩大问题上，第三国没有否决权。”转引自John J. Mearsheimer,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 5, 2014, p. 10。

③ 宋德星：《地缘政治、民主转型与俄罗斯外交政策》，《太平洋学报》2004年第12期，第52页。

④ 《普京万字讲话全文：西方骗了我们，直接把刀架喉咙上》，中华网，2022年2月25日，<https://news.china.com/socialgd/10000169/20220225/41454007.html>。

④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页。

是实现和平的最终方式。西方国家如果不能团结一致、不能在长期战略规划中接纳俄罗斯，那么短期的冲突、长期的区域和平将无从实现。”^① 也就是说，在处理欧亚大陆问题时，美欧的主要战略困扰有二：一是与具有战略雄心且实力犹存的俄罗斯之间的战略碰撞因双方“大欧洲”战略方案目标的根本对立而不可避免；二是在“大欧洲”规划中以接纳方式“消化”俄罗斯问题是美欧的战略必需，但中短期内难以实施，更不用说确保其战略成功。正是由于存在这两大战略困扰，导致美国难以从欧亚大陆事务中完全脱身。

（二）美国首要战略关切由陆向海的转变和对华联合阵线的构建

作为一门理论学说，“地缘政治就是研究核心大国和霸权国家的国际政治空间化问题。”^② 据此，当我们将冷战结束以来的地缘政治进行整体性思考时，就会发现美国地缘政治的焦点发生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变化，即从冷战结束后早期聚焦欧亚大陆到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聚焦“印太”地区，完成了从大陆向海洋的转变。美国地缘政治焦点的变化，不仅总体上塑造了其由陆向海的战略趋向，而且在这种趋向中强化了美国及其领导的海洋国家联合阵线与崛起的中国之间的战略博弈。也就是说，在“印太”地区应对所谓“中国的系统性战略挑战”和“赢得新的世界秩序之争”成为当下美国思考地缘政治的核心。不同于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思维，拜登政府在对华战略竞争问题上重视打造国际联合阵线，核心是美日澳印“四国机制”，其中又以优化对印关系和对日关系为主。^③

对于印度来说，“印太战略”架构下大国关系特别是对美关系的优化是其在国际权势转移背景下实现强国复兴的关键，核心是构建美日澳印“四国机制”。该机制首要的作用是可以满足印度与美西方主导的国际海洋体系之间的合作，其次可满足印度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基建等诸多战略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的战略诉求，最后可满足印度借助主要大国力量来制衡中国

① “For a Lasting Peace, Europe Must Embrace Russia,” *Defense One*, April 7, 2022, <https://www.defenseone.com/ideas/2022/04/lasting-peace-europe-must-embrace-russia/364130/>.

② Gearóid Ó Tuathail and John Agnew, “Geopolitics and Discourse: Practical Geopolitical Reasoning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11, No. 2, 1992, p. 192.

③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te House, February 11,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的战略需要。当然，印度也认识到这一机制的难点在于把握平衡，一方面要充分彰显其作为大国制衡中国的战略价值，另一方面又不能成为美国的战略棋子陷入被动。

对于日本来说，地理和文化之间的内在张力及其衍生出的地缘观念、权势思想和赌徒心理，促使日本总是在历史关键时期急切地参与国际权势大争斗，^①这也是日本大肆鼓吹“印太战略”的原因所在。实际上，该战略不仅放大了美日同盟的意义，而且放大了制衡中国的意义。据此，日本既可实现多向联合制华的目的，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独自处于对华抗争一线的不利局面。这样，在“印太战略”下，美日间的海权合作有了新的、更加强大的动能。

（三）对陆海两大方向国家关系的管理成为新的战略难题

上述欧亚大陆事态和“印太”海洋事态所引发的地缘战略大角逐，使动荡变革期的大国关系管理既成为一项战略必需，又是一项战略难题。

第一，俄罗斯被美西方“孤立”已是不争的事实。^②正因为如此，俄罗斯致力于“融入”欧洲、成为有影响力的欧洲大国的战略选择，在很长时期内都将难有实质性进展；而围绕乌克兰危机隐现的集团对抗趋势，使得其他国家发展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正常国家关系也备受考验。

第二，在英国脱欧和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法德轴心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得到了强化，一是其应对危机的能力相对较强，二是两国的政策影响力更大，三是在对热点问题的调解上作用明显。但与此同时，新欧洲也在积极发出自己的声音，欧盟的团结始终是一大现实难题。

第三，美国作为西方世界的领袖，其主导地位因“印太战略”和乌克兰危机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尽管拜登政府强调“美国的外交至关重要，美国的决心至关重要”，^③但问题是重点解决欧亚大陆问题还是聚焦于“印

^① 宋德星、殷实：《地缘属性、文化特质与日本的大战略缔造——一项侧重于地理与文化维度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8期，第56—64页。

^②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i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White House, March 2,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3/02/remarks-by-president-biden-in-state-of-the-union-address/>.

^③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i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White House, March 2,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3/02/remarks-by-president-biden-in-state-of-the-union-address/>.

太”事务，这同样考验着美国的战略智慧。

第四，在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一个特点是印度洋的战略意义充分彰显，印度特有的战略地位得以充分体现。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国家实力上升和地缘上的陆海复合依存关系，印度开始同时影响陆上和海上事态。

第五，随着“印太”架构下主要大国战略整合行动的展开，中美印三边关系及其战略运筹随之也具有了世界意义。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和印度势必将对华海权之争纳入较为宽泛的国际政治权势斗争的轨道，同时纳入相对具体的对华海上军事斗争的轨道，进而在全球层面放大海权之争的战略意义，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欧亚大陆的地缘价值。

总之，大国战略竞争决定了陆海两个方向大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管理复杂多元的大国关系也成为国际社会不得不面对的一大现实问题。

四、关于中国国家大战略的几点思考

在新的动荡变革期，大量未能解决的问题、不受控制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体的增长，新兴战略领域规则和规范的缺失，国际舆论撕裂和观念分歧，意味着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增多。对此，美国鼓吹全球极化和意识形态的分裂，并在其国家安全战略和政府文件中把中国和俄罗斯描述成“致力于破坏现有国际秩序、反对美西方的‘修正主义’大国”，其目的是在战略上捆绑盟友和伙伴，以便赢得所谓的“第二次全球对抗”。这显著增加了中国缔造国家大战略的难度。对于中国而言，国家大战略的缔造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作为现代化强国的世纪性崛起，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高度重视国家大战略成功所依赖的国内基础

就国家大战略的缔造与实施而言，其成功取决于能否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坚实的国内基础。也就是说，战略资源的投入、战略力量的部署、战略共识的形成、战略决策的优化、战略素养的提高，这些内部因素的意义不亚于与外部力量之间的战略博弈。为此，党的二十大报

告指出，要“坚持国家利益为重、国内政治优先，保持战略定力”。^①

坚持国家利益为重，核心是要厘清国家利益的层次，特别是要阐明核心利益之所在。也就是说，要阐释清楚什么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什么是重要利益；对国家利益不仅需要作系统的阐释和具体的分析，而且需要就核心利益、重要利益达成广泛的共识和一致认知，防止抽象地使用国家利益概念，特别是要避免对国家利益作工具性解释的、严重违背战略理性的倾向。^②

坚持国内政治优先，这是由大战略的本质属性决定的。正如英国大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所言，大战略在于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所有资源，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而这个目的，正是由基本政策即国家政策所决定的。^③ 基于此，无论是调节和指导战略资源的投入，还是确定战略目标，都取决于国内政治。对于中国而言，坚持国内政治优先就是致力于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其具备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和更加坚定的必胜信心。^④ 因此，在思考中国的世纪战略时，需要铭记国家大战略的力量源泉在于中国自身。从这个意义出发，国家大战略的国内维度优先于国际维度，这既是中国基本国情使然，也是大战略自身逻辑的结果。^⑤

保持战略定力，关键在于秉持现实主义的战略信条，即通过采取尽管不受欢迎（甚至遭到国际制裁）的战略举措，来促使世界认识到作为大国的中国不仅仅是概念和字面意义上的，而且确实是一个按照基本的战略规划不断迈进的战略现实。^⑥ 今天，保持战略定力很重要的一点，仍然是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⑦ 不落圈套，不落陷阱，按照既定战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4页。

② 宋德星：《中国崛起的大战略理论建构》，《国际展望》2013年第6期，第46页。

③ [英]利德尔·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战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9页。

④ 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5—16页。

⑤ 宋德星：《战略现实主义——中国大战略的一种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9期，第9页。

⑥ 同上，第4—17页。

⑦ 《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4年11月29日，

略目标和战略部署稳步推进各项工作。

（二）高度重视外部环境优化问题对国家大战略的重要意义

就国家大战略决策而言，一国能否稳步实现自己的大战略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家们怎样认识其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怎样进行国际政治斗争。如前所述，今天的世界更加多元、复杂、能动和动荡，这一外部环境给国家稳步实现大战略目标增加了难度。

更加多元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权势的分散化。结果之一是涌现出多个力量中心、多种行为模式、多元价值取向、多维战略博弈；结果之二是国际体系、主权国家、超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各自的能动作用得到充分释放，相互间关系及战略效应同时在多个向度上映射。这对于国家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在于其可选择性增多了，挑战则是整体的掌控力不可避免地下降了。

更加复杂的原因在于分野与融合这对矛盾被日益放大。也就是说，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传统战略领域与新兴战略领域、传统议题与新生议题、传统力量建设运用与新质力量建设运用等诸多方面，决策者既要坚持二元思维，又要强调跨域融合；既要坚持科学筹划，又要善用经验判断；既要追求单维目标，又要实现整体优化。不仅如此，在战略决策方面，国务活动家、专家（包括但不限于外交、军事、国际关系、国际法等）和科学家（包括但不限于工程、技术、生物、医药等）“三位一体”共同参与也势在必行。

更加能动的原因主要是体系层面高度结构化的权势控制明显松弛，使 21 世纪国际体系的特点不同于过去的多极、两极或单极体系，未来国际体系可能囊括“多重秩序”从而形成一种“秩序间”关系(inter-order relationships)的复杂网络。^① 在这样的网络中，国家的能动性显著增强，因为它们都能找到使自身力量和作用得以发挥的领域。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htm。

^① 之所以说“多重秩序”，是因为主要的张力可能源于秩序内部和不同秩序之间，而不是在多个主权国家之间。巴里·布赞认为，国家社会是“二阶社会”，因为其成员不是个人，而是集体。据此可以推断，正在出现的国际体系也属于“二阶体系”，因为它的成员不是单独的国家，而是由国家组成的集体。参见 Flockhart Trine, “The Coming Multi-Order World,”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37, No. 1, 2016, p. 23。

更加动荡的原因在于国际权势的分散化趋势不可避免，民粹主义作用下国际政治文化的异化趋势不可避免，大国地缘战略首要关切的历史性变化催生的世纪大角逐趋势不可避免。加之国际规则、规范的失序，不负责任行为体的增长，新旧矛盾问题的叠加，世纪疫情的深远影响，都使得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①

上述外在环境的系统性变化，决定了当今时代避免战略冒险行动的难度也显著上升了。原因在于“战略焦虑时代”与激进的民粹主义情绪，使得审慎、克制和战略耐心这类关键性的战略素养无法得以彰显，国家渴望的是力量优势以及凭借力量优势实现战略突破，而不去充分考虑力量运用背后隐藏着的巨大风险。^②正因为如此，战略审慎作为一项重要的大国战略素养，需要大力坚守；^③并且，优化国际战略环境应被作为战略审慎的重要方面，这是因为大国的重要性不在于它们指挥航向，而在于它们提供了一个稳定、安全的框架，让各国在其间能航行自如。^④如此，国家大战略才有可能少一些外部阻力，多一些战略追随者，其成功的几率也就大为增加。

（三）动荡变革期国家大战略运筹需要把握的关键环节

在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国家大战略的运筹将不得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展开，去直面巨大的不确定性；将不得不在大国战略竞争格局中展开，去直面诸多强劲的对手；将不得不在各种价值取向并存的时代大潮中展开，去直面思想观念的碰撞。^⑤因此，作为一项重要的使命，运筹国家大战略尤需把握好以下关键环节。

第一，增强战略思辨性。新时代既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又是一个“战略焦虑时代”。一方面是国际危机事件不断发生，另一方面是国家在总体上还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6页。

② Paul W. Schroeder, “The Risks of Victory: An Historian’s Provocation,” *National Interest*, No. 66, Winter 2001/02, pp. 22-36.

③ “公民的审慎”是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总结罗马帝国衰亡原因时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参见[英]C. R. 波特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1)：文艺复兴(1493—1520)》，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④ 罗伯特·A. 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第374页。

⑤ 宋德星：《大变局下中国外交的时代风貌与主要实践》，第12页。

没有做好应对重大危机事态的心理准备，结果是危机感和挫折感同时增长。^①恰如布热津斯基所述，“我们正处在全球政治觉醒的时代，因此，政治思想大概会越来越重要，它要么成为精神凝聚力的源泉，要么就是混乱之源；要么成为达成政治共识的基础，要么就是冲突的祸根。”^②因此，强化战略思想引领，增强战略思辨能力，对于国家大战略而言不仅至关重要，而且任重道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时代呼唤伟大的战略家。

第二，客观理性地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对于世界来说，崛起的中国作为国际政治中的关键性变量，已经并将继续作用于国家关系、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对于中国来说，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维护与拓展已经与世界大势不可分割。这是因为中国的崛起作为历史必然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作为历史必然已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中国力量走出去作为历史必然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作为历史必然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③上述历史必然决定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④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⑤

第三，掌握好力量运用的艺术。力量运用是千百年来持续不断的国际政治现实，因此警觉的政治领导人就必须持续地计算权力，并仔细辨识和把握各主要力量手段的本质属性。这是因为作为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它们在战略缔造和实施过程中的工具价值各不相同，且功能各异，因此只有把握其特殊属性，才能发挥好它们各自的战略效用。^⑥21 世纪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国家力量的累积与运用格外敏感和关注，这是因为中国赋予了自身一个全新的身份——“强起来”的中国。尽管这一新的身份属性既基于历史认知的逻辑，

① 宋德星：《战略现实主义——中国大战略的一种选择》，第 12 页。

②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潘嘉玢、刘瑞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序言，第 2 页。

③ 宋德星：《大变局下中国外交的时代风貌与主要实践》，第 7—8 页。

④ 参见《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人民网，2014 年 3 月 30 日，<https://cpc.people.com.cn/n/2014/0330/c64094-24773108.html>。

⑤ 参见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21 年 10 月 25 日，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1-10/25/c_1127992532.htm。

⑥ 宋德星：《国际关系中的力量运用——侧重于中国方面的分析》，《外交评论》2010 年第 6 期，第 68 页。

又基于现实发展的逻辑，是客观和主观的有机统一，但其也不可避免地使中国的实力增长和力量运用成为国际社会和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从而增加了调节和使用大战略手段的困难。有鉴于此，掌握好力量运用的艺术，不仅是对力量进行战略运筹的应有之义，也是国家“取胜之道”的要义所在，核心是在战略必需与适度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①

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曾指出，一个成功的战略必须包括四个基本要素：一是恢复国内经济实力的基础，特别是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把权势资源转化为有效的影响力；二是保持地缘政治上的军力平衡；三是管理开放的国际经济，这有助于在维持全球范围内的相对优势的同时不损害国内长远利益；四是倡导各种多边体制和制度，以组织国家间的集体行动，应对跨国问题和防止过度伸张。^②显然，这对于中国来说同样适用。因此在对国家大战略进行思考和缔造时，需要对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都予以重视，也就是胸中要装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并将大战略缔造视为一个需要不断进行调整、优化以确保其内在动态平衡的过程。^③

[责任编辑：石晨霞]

① 宋德星：《国际关系中的力量运用——侧重于中国方面的分析》，第69—71页。

②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p. 242.

③ 参见宋德星：《中国崛起的大战略理论建构》，第27—46页。